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谭嗣同



7
254.5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97
B254.5
1
2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谭嗣同

朱广簪 编著

目 录

一、少年壮志	(1)
二、振兴工商业	(6)
三、推行湖南新政	(11)
四、冲破封建罗网	(22)
五、推动新法	(28)
六、为变法而死,死得其所	(41)

C

367988

24

在绿色掩映的湖南浏阳城外石山下，矗立着一幢华表，华表上镌刻着几行遒劲的大字：

亘古不腐，片石苍茫立天地；
一峦挺秀，群山奔趋若波涛。

原来这里长眠着一位在近代中国史上叱咤风云的杰出人物——谭嗣同。华表上的诗句正是后人对这位变法运动勇士的景仰和追念。

一、少年壮志

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华相众生、东海寰(qian)冥氏。他的祖辈从明朝末年起定居湖南浏阳，世代为官。祖父谭学琴，是清朝最高学府——国子监的学生。父亲谭继洵(xún)，在进士考试中遥遥领先，获得一甲第二名(俗称榜眼)，因此担任了户部主事，后升任户部郎中。父亲37岁那年(1865年)，谭嗣同出生在北京宣武门外澜(lán)眠胡同一座大宅第中。这个小生命的诞生，给谭家带来了无限的欢乐。

然而，谭嗣同却生不逢时，大清王朝康熙乾隆时期的太平盛世景象，到这时已荡然无存，日益深重的内忧外患却接踵而来，从士绅到百姓，他们都感到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经历了两次列强大规模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之后，创深痛巨的中国士绅对世界仍然一无所知。他们还不知晓，在19世纪上半叶，英国等列强，陆续完成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的巨大成果不仅产生了使用机器生产的资本主义大工厂，而且，他们把根本改变生产手段的蒸气机装在了用于海外殖民的军舰

上,用当时最先进的技术生产的后膛装弹的来复枪装备了殖民军队。在工商业资本家疯狂的怂恿下,列强凭着坚船利炮,开辟了一片又一片的殖民地,不断地掠夺殖民地的财富,又不断地向殖民地倾销商品。从1840年起,中国成为列强重要的侵略和掠夺对象。屈辱悲愤的历史便从此开始:割地、赔款、开辟通商口岸和租界、领事裁判权和片面的最惠国待遇、准许通商口岸停靠外国军舰、允许外国传教士在中国自由传教并建造教堂。列强的侵略使清王朝本来就已经十分尖锐的社会矛盾愈益加剧:天灾人祸频仍,全国各地的灾民人数在急剧增加;洋布滚滚而来,使原来以纺织为业的人失去了生活来源;为了支付数额巨大的赔款和镇压太平天国的军费开支,清政府不断增加捐税种类,提高税额;与此同时,各级官吏肆意欺诈百姓,巧取豪夺……清王朝的残暴统治迫使贫困百姓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反抗清政府专制统治的斗争在这一时期此伏彼起。谭嗣同从小就耳闻目睹了这一切,社会动荡不安、民族的屈辱和百姓的苦难在他的心灵里打上了烙印。

少年时期的谭嗣同聪颖好学。5岁时,他在北京开始读书。时间不长,他就能准确地分辨四声,与人应对作诗。他不用教师督促,自觉地把所学的内容全都背诵下来。8岁那年,由于疲劳过度,嗓子不能发出声音,像撕肝裂胆一样疼痛难忍。可是,他依然如故,起早贪黑地读书。母亲从浏阳老家归来听说了这件事,既心疼孩子,又为孩子的作为感到欣慰。她笑着对家人说:“这个孩子倔强,能自立自强,我死了以后,可以不必担忧了。”

10岁,谭嗣同拜欧阳中鹄(hú)为师,学习中国的文化典

籍。欧阳教师不仅有渊博的知识,而且还具有忧国忧民、改革时政的进步思想,这些对谭嗣同的成长起了重要的作用。和所有的宦官家庭一样,父亲希望嗣同能够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然而,谭嗣同的志向却不在这里,他在课本上写了“岂有此理”4个字,并且批评科举考试对国计民生没有任何帮助,反而使人皓首于八股文。在欧阳教师的熏陶下,他好学深思,善于从先秦经学、诸子、宋明理学和清代诸家的学说中吸收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内容。他向往能经国济世、学以致用学问。明朝末年王夫之、黄宗羲对儒家思想和封建制度的批判精神和清朝中期龚自珍、魏源所倡导的经世致用思想对谭嗣同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他如饥似渴地钻研他们的著作,希望有一天能实现改造中国的宏伟志向。

要一展宏图,必须要有勇猛顽强的精神和技艺超群的武艺。谭嗣同专门请蜚声京内外的武林高手大刀王五传授击剑术。大刀王五早年曾在直隶(河北)、河南、陕西和甘肃一带杀富济贫、扶弱锄强,人们称他是“义侠”。谭嗣同钦佩大刀王五为民解难的仗义之举,决意为了国事而练武强身。

12岁那年,北京城内外流行瘟疫。谭嗣同的母亲、姐姐和哥哥3人相继去世。他自己也被传染,一直昏死3天才醒来。经过这场灾难,谭嗣同痛失3位亲人,他忍受了骨肉离别的痛苦。然而,母亲尸骨未寒,谭嗣同又遭受了庶(shù)母的歧视和虐待。他痛苦万分,走投无路,几次被推到死亡的边缘。处于这样艰难困苦的生活中,他感悟到生命是那样的微小,不过是具躯壳。但是,除了让这一躯壳为了别人而存在之外,又有什么可惜的呢?他崇拜墨子的“兼爱”、“任侠”和“摩顶放踵”的

精神境界，要不分亲疏远近地爱别人，用自己的力量舍死忘生地去帮助别人，只要对大多数人有利，即使自己全身从头到脚被消磨掉也心甘情愿地去做。

1883年，谭嗣同跟随父亲赴兰州任所。在西北边寨广袤(mào)的原野上和层峦叠嶂的山峰中，他尽情地跃马驰骋。壮丽的河山开阔了他的胸怀，更激起了他对祖国锦绣山河的热爱。各地的风土人情和人民的疾苦使他加深了对社会的了解和认识。第二年，法国军队侵犯滇闽，中法战争爆发，清政府在战场和外交上首鼠两端。对此，谭嗣同不能理解，感到十分困惑。为了探索一条改变中国现状，而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并驾齐驱的途径，他开始漫游各地，结交同志，访求民情。在长达十年的漫长旅途中，他的足迹遍及直隶、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台湾等省，耳闻目睹了民不聊生，路有饿殍(piǎo)的惨景。因而，谭嗣同发出了“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城郭犹是，人民复非”的哀叹。

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但是，清政府一意妥协投降，致使中国军队遭到惨败。听到这一噩耗，谭嗣同奋笔写了愤怒的诗篇：

世间无物抵春愁，
合向卷冥一哭休；
四万万人齐下泪，
天涯何处是神州。

这首诗的大意是：人们说“春愁最愁人”，可是当前的民族危机，就是最大的春愁。它给我增加了无限的痛苦，这痛苦折磨着我，我应该向着苍天，痛哭一场，一泄我久积在胸中的愤

懣(mě'n)。这不只是我一人这样,民族危亡,使四万万中国人都一齐流下悲痛的泪水,我遥望天边,痛苦地思索:理想的中国在哪里呀?

1895年3月,中日《马关条约》签订。中国被迫赔偿军费2亿两白银,将台湾、辽东半岛、澎湖列岛及附属岛屿割让给日本。消息传到国内,举国哀痛。从爱国士绅到普通民众都切齿扼(è)腕,痛恨卖国贼把民族国家的利益视同儿戏,一些在北京的台湾省籍人不禁失声痛哭。时在浏阳的谭嗣同,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一人独自在房内彷徨,痛定思痛。

当时,正值全国各地的举人在北京参加进士考试。广东举人康有为邀集应试的1300名举人,联名上书皇帝,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因举人进京考试乘坐公家提供的车马,所以称这次上书为“公车上书”。虽然,都察院以《马关条约》已签为由,拒绝接受“公车上书”,但上书被广泛传抄和刊印,从此揭开了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的序幕。

这时远在湖南的谭嗣同,虽然还没有机会与康有为会面,然而他的思想却与康有为等人的思想在很多方面不谋而合。在艰难的探索中,谭嗣同形成了自己改造中国的思想体系,找出了一条挽救民族危亡的道路。针对朝廷内外死抱“祖宗之法不能变”的顽固势力对维新事业的扼杀,谭嗣同在致朋友的一封信中明确地指出:“当今清政府所实行的不但不是儒家学说所倡导的治国之策,而实际上是暴虐的秦朝所实行,并导致中国两千多年社会动荡不安、黑暗腐朽统治的制度和法律法令。实行这样的制度和法律法令还不如没有制度和法律法令,尚且如此还说这样的制度和法律法令不应该变吗?即使是在今

天全部地采用周公所制订的尽善尽美的制度和法律法令,也不会有任何实效,因为时势已经不同了。”“在今天,借鉴外国的制度和法律法令,而弥补中国所无,这是中国挽救民族危亡的必由之路,是大势所趋。”他批评一些官僚只从外国引进机器技术不过是拣了芝麻而丢了西瓜,而学习西方的根本则是学习他们卓有成效的制度和法律法令。接着,他提出了系统的改革方案:改变官吏和民众的衣冠式样,迁都中原,皇帝除旧布新、开辟新的局面,改革水路粮运,开发水利,废除科举制度。创办各类学校,兴办铁路、矿业,改用钞票等。为了使改革方案得到顺利实施,他提出了保障改革成功的4项措施:筹集变法经费,创造变法的条件,树立变法的权威,招揽变法人才。谭嗣同变法思想的核心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为模式,改造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进步思想不仅揭示了时代发展的方向,预示着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将面临着前所未有危机,而且标志着谭嗣同开始了一个崭新的奋斗历程。

二、振兴工商业

1896年春,谭嗣同随父亲北上到达北京。为了考察天津工业设施的发展状况,探索发展湖南工商业的有效途径,谭嗣同专程去天津参观那里的机器厂、轮船、船坞、铁路、火车、铁桥、电线等工业设施。在那里,他看到新引进的技术和设备,领略了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对这些耳目一新的东西,他赞叹不绝,称赞这些设施规模宏大,至精至当。希望湖南以此为样板,

发展湖南的工业。

然而，刚刚走出天津城，一幕幕惨不忍睹的情景映入谭嗣同的眼帘：由于去年水灾而陷入困境的灾民，自己搭席为屋，暂栖在河堤上。那些席棚只有一尺多高，长如身，看起来像个柜子。那些灾民面容憔悴，身体瘦弱，大约数千人。谭嗣同不忍心目睹这一惨景，怀着深深的悲哀，掩面而过。他想，这些难民已悲惨至极，然而又不知有多少难民不堪饥寒而死去。于是他发誓用尽自己的一切力量，去拯救同胞。

谭嗣同把振兴工商业，发展资本主义当作拯救同胞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一个重要途径。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有充足的资金用于赈灾扶贫，使灾民们得以糊口，恢复生产，进而不断铲除造成人民贫困的根源。然而，振兴工商业也并非轻而易举的事。中国人历经 20 多年，向西方学习，开办各种工厂，然而却困难重重，步履蹒跚，其中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过去对华侵略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在中国的权益。在商品倾销的同时，进行资本输出。到这时，列强不仅控制了中国的海关，并逐步将侵略的魔爪伸向盐税、厘金（对生产运销过程中商品征收的捐税）和铁路建设。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使中国完全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在民族危机进一步加剧的情况下，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痛感民族沦亡在即，而试图通过采取兴办实业，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方式，来挽救民族危机，抵制列强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势力的扩张。1895 年到 1898 年间，国内新创建的商办厂矿有 60 多家，其中 80% 属于轻工业，总投资额为 1240 多

万元。但是,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面临着来自外国资本主义的排挤和封建政府的压制,步履艰难,封建政府对民族工商业进行刁难、勒索,使民族工商业难于与外国资本主义的在华企业竞争。外国资本家利用中国的原料、廉价劳动力所开办的大型工厂,以其生产规模大,产量高,成本低的雄厚优势压倒了中国工业。在商品纳税方面,外国资本主义得到清政府的优待,而中国商品在流通过程中关卡重重,捐税繁多,这样就使得资金少、技术设备落后的中国民族工商业,在与外国资本主义企业的竞争中,受到排挤,而处于经常亏损乃至破产的境地。

谭嗣同看到帝国主义张开血盆大口吞噬中国民族工商业,十分忧虑。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鞭策着他提出救亡图存的方案:大力开采矿产,发展资本主义;用本国充足的经济力量来对抗列强的经济侵略势力,以使祖国真正富强。

去天津考察不久,谭嗣同的父亲为他捐官(用交纳捐款的办法取得官职),为候补知府,分司浙江。在临上任前,他拜访了光绪皇帝的教师翁同龢。翁同龢在日记中写道:谭嗣同“通晓洋务”。6月底,谭嗣同到达南京任所。他到任后,目睹了官场的黑暗和官吏的贪婪。他特立独行(指有见识、品行端正,不随波逐流),不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谭嗣同虽身居南京,但振兴祖国工商业的抱负使他时刻关怀着湖南的兴衰,并与湖南的朋友频繁联系,商讨兴革大事。

刚刚就职的湖南巡抚(省级地方政府长官)陈宝箴,受到谭嗣同爱国思想的感染,接受谭嗣同实业救国的方案。于1895年11月,奏请清政府设立湖南矿务总局。不久,为了商

谈创办矿业的具体办法，谭嗣同离开南京，赴湖南面见陈宝箴。恰巧这时欧阳中鹄也来到长沙，做陈宝箴的幕僚（官府中辅佐行政的人）。他对办矿有一定经验。谭嗣同万分喜悦，立即和他的老师进行商量。他们打算先从开采煤矿入手，运进机器，物色矿师，以期事半功倍。师生二人，情投意合，谈得十分热烈，一直到深夜，才把开矿事宜设计得滴水不漏，非常周祥。

湖南矿务局成立后，谭嗣同与欧阳中鹄、唐才常、刘淞芙等人共同筹建湘矿。与唐才常、刘善涵开始在浏阳东乡开采“安的摩尼”（即锑）矿石，矿石经过化验，证明是质量优良的稀有矿。于是唐才常筹划在浏阳西乡跃龙市创办煤井。谭嗣同并为已于1896年由官办改为商办的汉冶萍公司采办炼焦用煤，等等。

湖南矿务总局先后开采了煤、铜、锡、锑、璜等矿。把企业分为官办、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三种形式经营。官办、官商合办的企业，由总局派员主持；官督商办企业，由商人自己管理，但总局要按章抽税，会同地方官“维护”地方局面。在三种企业中，官办、官商合办的企业，因官员徇私舞弊，经营不善，收效不大。而改为商办以后，如益阳板溪锑矿，获得了较多的利润。因此，不少人要求由商人独立创办企业。对此，谭嗣同坚决支持。他多次请求陈宝箴，允许商人招股开矿，设厂生产，并准其专利若干年。在谭嗣同的呼吁下，以往开办的一部分官督商办矿业企业改为商办。同时，私人创办的工矿企业也陆续出现，并获得明显的发展。士绅梁肇荣等创办了湖南水利公司，获得专利10年。湘潭人张本奎等创设化学制造公司，制造樟脑，被允许在湖南境内专利15年。此外，张祖国等创办的和丰火柴

公司,黄自元等创办的宝善成公司,也曾得到湖南当局的鼓励。

自长沙至湖北蒲圻、咸宁、江夏等县站,设置了有线电报。在交通和运输方面,谭嗣同筹划了湘粤铁路、内河轮船公司的兴建。当时,宝善成公司创办电灯,先在衙署内试照后,打算扩大到全城。但有些人窃窃私议,怀疑电灯有损人的健康,况且电线交错,难免招致火神之灾。为此,谭嗣同写了一篇《论电灯之益》的文章,根据他所理解的自然知识,加上推测,说明电灯的益处,消除人们不必要的疑虑。

谭嗣同积极参与了在湖南兴办资本主义工矿企业的活动。在此期间,他深刻体验了在内部资金缺乏和外来势力排挤的情况下经营企业的艰难。

当时湖南矿务总局决定对商股进行控制,如接收唐才常、刘善涵和谭嗣同等筹划开办的“安的摩尼”矿,改为“官办”。谭嗣同对于这种排斥民族资本的行径非常不满。指出:这样一来,企业的权与利都被当局所占有,不但民不准过问,即使是一切有益的公事也都不能分享其利,这是“最不善的办法”。改为官办的“安的摩尼”矿,由于当局“负责人压抑商股而专横跋扈,同时又巧立名目,敲榨勒索以饱私囊”,而惨淡经营。这些使谭嗣同深切感受到“上权太重,民权尽失”,感受到封建专制政府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压榨与摧残。

在与一些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人物的交往中,他更深入地了解了他们的愿望和要求,产生了强烈的愿望:新兴的资产阶级必须摆脱封建势力强加在自己身上的桎梏,争取得到政治上的解放,并分享一部分政权,然后才可能冲破封建经济对

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限制和干扰,而使资本主义获得顺利的发展。所以他一方面希望封建地主投资于新式企业,并设立学校,讲求科学技术,培养专门人才,以便有计划、有步骤地把工业和农业纳入机器生产的道路;另一方面希望统治者改变压制民族资本主义的政策,借鉴西方国家发展资本主义的经验,允许“官民”自由地兴办工矿企业,不但“予以自主之权”,不加“禁阻”,而且“鼓舞其气”。减轻捐税,如果厘金暂时不能废除,也应“以学会及商会中人办理厘金之事”,使资产阶级拥有参与理财的权利,从而杜绝征收厘金的种种弊端,然后逐渐代以印花税,这样才能使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发展,才有可能与列强并驾齐驱。为此,就必须实行政治上的变革。

三、推行湖南新政

湖南是变法维新运动中最有成效的一个省。而在其中扮演推动和领导角色的人物,应当首推谭嗣同。

1897年10月,谭嗣同应湖南巡抚陈宝箴的邀请,从南京回到湖南。与湖南学政江标、按察使(主管地方司法刑狱和官吏考核的官员)黄遵宪以及熊希龄、皮锡瑞、唐才常等人,一同开始了推行湖南新政的工作。

倡导、兴办学会是湖南新政中一项重要内容。追溯中国历史,中国古代并没有学会这种事物,学会的产生是近代以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觉醒的标志,是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组织成立的。维新人士认为,近代中国屡屡被列强打败,是因为全国4亿人形同散沙,大家没有为民族和国家利益奋争

的凝聚力。因此,要使中国摆脱危亡,就必须“合群”(结成团体,协同一心,共纾国难),养成公德。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借助学会,开发民智,培养民德。

1895年,康有为等人在北京成立的强学会(由拥护光绪皇帝的官员文廷式出面组织,会长由户部郎中陈炽担任),这是维新派成立最早的具有政治团体性质的组织。强学会以挽救时局为宗旨,每10天集会一次,大讲“中国自强之学”和挽救民族危亡的道理。强学会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教师翁同龢的支持,曾一度吸引了许多官员和士大夫。会员数千人。强学会成为传播变法思想、积蓄维新力量的阵地。然而在1896年初,北京强学会遭到朝廷封禁。谭嗣同听到强学会被清政府封禁的消息后,极为愤慨。原本并未参加强学会的谭嗣同,偏偏在强学会被封禁之后,立即在汉口着手建立湖南强学分会。经过多方努力,强学分会虽然没有建成,但却表现了谭嗣同与封建势力勇敢抗争的精神。

1897年冬,德国强占胶州湾,帝国主义日益加紧瓜分中国的步伐。康有为在上海闻讯后,急速赴北京。第五次上书光绪皇帝,指出:瓜分大祸,迫在眉睫,必须当机立断,迅速维新变法,否则“皇上与大臣想在都城做一个平民百姓都做不成了”。光绪皇帝读后深为感动,表示不甘做亡国之君,随即准备亲自召见康有为。恭亲王奕訢和一些守旧大臣以“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不得召见”为借口,从中阻拦。光绪帝改令康有为上递条陈(向上级陈述意见的文件)。

这时,谭嗣同、唐才常等人“思保湖南之独立”,使“南支那”可以不亡,因而筹议组织南学会。在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支

持下,南学会于1898年2月成立。组织南学会,本是想从湖南一省做起,逐步把南方各省仁人志士联合起来,共同探讨爱国之理,寻找救亡之法。南学会在长沙设立总会,由陈宝箴选派本省10位士绅担任总会长,再由这10人联络会友。会友分三类,一是议事会友,由南学会创办人谭嗣同、唐才常充任,职责是议定会中事务章程;二是讲论会友,定期讲学,随时答问,公推皮锡瑞主讲学术,黄遵宪主讲政教,谭嗣同主讲天文,邹代钧主讲地理;三是通讯会友,承担回复咨询的工作。南学会规定每周开一次大会,或公议地方的事情,或由谭嗣同等人发表演讲。听众十分踊跃,每次都有近千人参加。

谭嗣同演说时,常常挥动有力的手臂,气势激昂,他的观点明晰,语言犀利,深深地打动了听众的心。在南学会。谭嗣同发表的第一次演讲题目是《中国情形危急》。他沉痛分析了·中国被帝国主义侵略而面临着的被瓜分的危险。在《论今日西学皆中国古学派所有》的演讲中,他热情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进代论和天赋人权论的思想,猛烈抨击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谭嗣同对着千百位听众大声说:“君主是什么?他应是老百姓推举出来为天下人办事的人。在君与民的关系中,民为本,君为末,先有民,后有君。如果君主骄奢淫欲,不能替天下人办事,人民就有权废掉他。实行变法就是要废除君主专制,还政于民,这才是救国的根本之道。谭嗣同在演讲《论全体学》(即生理学)时,他形象生动地说:“大自然造就出像精巧机器一样的人体,就是要让人们顶天立地,干出一番事业。大家想想,这堂堂七尺之躯,不是为给人当奴仆、做牛马的。我们现在不振作起来,离给别人当奴仆、做牛马的日子不远了。”听着

这些闻所未闻、又着实说到人们心坎里的话，台下屡屡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掌声。

谭嗣同希望通过南学会来团结维新人士，开导风气，并不只是着眼于湖南，而是以湖南为基础，将变法成果扩及全国，力图掀起全国性的变法维新运动。同时，谭嗣同还寄希望南学会在一定程度上担当起“议院”的作用。他认为，要图谋改革，实施新政，关键在于平权：“即官不可居民之上而独尊，民不可受制于官而尽失其主人之权”。必须在平等的基础上，使南学会拥有议政之权，谭嗣同指出：“西方国家对于议事和办事机构的区别是最严格的。议院是议论政事的机关，官府是行政机关，这种制度表明，议政和行政各不相侵，也没有偏重，议政和行政体现大公无私，公开地互相牵制。这种统治办法是最善而又没有弊端的。”正是出于这种思想，谭嗣同希望把南学会办成全湖南省的总学会。府厅州县设立分学会，分学会受成于总学会。如果官府要兴办什么事业，应首先与学会商议，学会议定后，官府才可以实行。如果意见不一致，则要遵从学会内多数人的意见。如果百姓想兴办什么事业，首先要将议案呈送给南学会的分学会，分学会转呈给总学会，总学会同意后，所提议案就可以实行了。一定要使大吏不敢肆意骄横，小吏不敢欺诈百姓，如果照此行事，便能够达到兴利除弊的目的。谭嗣同以南学会为活动中心，团结了一部分迫切地要求革新的维新人士，并得到陈宝箴的支持，他对湖南的兴革事宜多资策划，从而促使湖南的的维新运动迅速地开展起来。

在南学会的影响下，湖南各府州县纷纷组织学会，最著名的是浏阳群萌学会、郴州舆算学会、常德明达学会、衡州任学

会。这些学会团结有志之士，研习算学、物理、化学、地理、经史大义、掌故，培养改造社会的人才，对于削弱陈腐守旧的顽固势力，传播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推动维新运动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南学会积极参与推行新政，倡导设立课吏堂，以培训新式官吏。开办课吏堂是使那些不懂得世界发展形势，不懂得近代知识的守旧官僚进修学习。陈宝箴对此深表赞同，并责成黄遵宪总理其事。课吏堂的课程，分为学校、农工、工程、法律、警务、外交六类。官吏所进修的课程，都是湖南新政的重要内容。

在南学会的倡导下，湖南仿照上海租界巡捕房的形式，设立了一个由官绅合办的维持市区秩序的机构——保卫局。谭嗣同建议保卫局，不仅要能够抵御帝国主义的蹂躏和屠杀，而且要附属设立迁善所，拘留有流氓、拐骗、盗窃等行为的人，强制他们劳动、学习技艺，使他们在被释放以后，能够弃恶从善，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不仅如此，谭嗣同等维新志士在积极创办学会以外，还致力于移风易俗的工作，使得社会风气和社会习俗方面也有了明显的变化。

维新运动期间，维新派把戒除妇女缠足作为社会风俗变革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广为宣传，认真组织。1896年广东顺德县倡立“戒缠足会”。随后，梁启超也在《时务报》上发表《戒缠足会叙》，宣传男女平等的思想，痛斥歧视损害妇女的封建陋习。1897年，谭嗣同、梁启超、康广仁等在上海发起“试办不缠足会”。1898年春，维新派人士荟集湖南，由谭嗣同、梁启超、黄遵宪、唐才常、徐仁铸、熊希龄等16人为董事，在长沙发起